

子路勇德新探

程文霞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肇庆

【摘要】子路以“勇”著称于孔门，他有天生的勇武，也有在孔子教化下的成长，还有生命实践的升华。文章认为子路勇德发展有三个层次：初入孔门时的一种未经礼义节制的原始生命的“血气之勇”；经孔子礼义智重塑后的获得理性规范与道义方向的“君子之勇”；以及以生命践履杀身成仁的“仁之大勇”。子路的勇德，既展现了个体德性成长的典型范式，也折射出先秦儒家勇论的内在张力。勇作为“三达德”之一，其最高境界并非“杀身成仁”，而是仁智勇三者最和谐的日常生命状态。

【关键词】子路；勇德；血气之勇；君子之勇；仁之大勇；三达德

【收稿日期】2026年8月5日

【出刊日期】2026年9月7日

【DOI】10.12208/j.ssr.20260295

A new exploration of Zilu's courage and virtue

Wenxia Cheng

Guangdong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Abstract】 Zilu was renowned within Confucius's school for his courage; he possessed both an innate martial spirit and a courage cultivated through Confucius's teachings, as well as a courage refined through his lived experie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Zilu's development of courage and virtue unfolds across three distinct levels: the “blood-and-energy courage” of a primal, unbridled existence encountered upon his initial entry into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 “courage of the noble man” —one imbued with rational norms and moral direction, shaped by Confucius's teachings on ritual propriety and wisdom; and the “great courage of benevolence,” manifested through the life-practice of “sacrificing one's life for the sake of achieving humaneness.” Zilu's embodiment of courage and virtue not only presents a typical paradigm of individual moral growth but also reflects the inherent tension within the pre-Qin Confucian discourse on courage. 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Virtues,” the highest state of courage is not “sacrificing one's life for the sake of achieving humaneness,” but rather the most harmonious everyday life state encompassing benevolence, wisdom, and courage.

【Keywords】 Zi Lu; Courage and virtue; Courage rooted in blood and vitality; The courage of the noble person; The greatest courage of benevolence; The Three Great Virtues

1 引言

勇德是先秦儒家德目谱系中的重要德目，《论语》中论“勇”有十四处，其中五处都与子路有关，子路之勇极具生命张力与成长特质。历来对子路勇德的研究多聚焦于性质界定、德目关系、成长过程、形象变迁等多维视角，而较少关注其在生命历程中的动态生成与内在进阶。事实上，子路之勇德，贵在能进，非止于气力，能随义理而日新。其一生刚健不息，勇于改过、勇于实践、勇于赴义，生命呈现出一种由粗入精、由外而内的上升维度，最见成长之气象与张力。这一成长性维度，恰是重新理解儒家“勇”之内生机制的关键入口。本文以勇德的成长与升华为视角，系统考察子路勇德

从“血气之勇”到“君子之勇”再到“仁之大勇”的发展脉络与思想意蕴，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子路之勇与儒家理想勇德之间的差距，揭示先秦儒家勇论的深层张力^[1]。

2 子路原始生命形态的“血气之勇”的一体两面

子路未受孔门教化之前的勇德，属于原生态的血气之勇。其底色质朴无暇，兼具刚柔两面，蕴藏着日后勇德升华的根基。考察子路原始的生命形态，《孔子家语》与《史记》各存一则珍贵记载，前者显其“勇”之柔，后者显其“勇”之刚，二者合观，恰可窥见子路血气之勇的完整面貌。

《孔子家语·致思》^[2]载子路对孔子的自述：

“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歿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若过隙。”孔子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①

“常食藜藿，为亲负米百里”，这是年轻子路内心的柔软，可以苦自己，不忍苦年迈的父母；“不可复得也”，这是功成名就后的子路，内心最想做的依然是“百里负米”。子路天性中对父母的深情与责任。这种质朴的孝心，虽未经礼义点化，却已是仁的端倪。仁，“爱人”，是对亲人的爱与责任担当。此种勇，是子路之勇最动人、最善良的内核。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3]中记载：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豶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②

司马迁以“性鄙”“伉直”二语，精准概括出子路勇的野性质地与质直内核。“鄙”言其未经文饰的朴野，言行无谦抑节度；“伉直”谓其刚硬而率直，善恶分明、不畏权贵；雄鸡冠、豶豚皮饰都是上古勇武象征。可见，子路以勇力自雄。值得注意的是，子路之“陵暴孔子”。

“子路陵暴孔子，可能是反对季氏对新开垦的土地征税。”一个是刚硬正直的农民青年，一个是恪尽职守的小吏，“话不投机子路便可能动起手来。”^[4]这是一个尚未被任何文明规范驯化的生命形象。“孔子设礼稍诱子路”，设的可能是“射礼”^[4]。鲁国每年有射箭比赛，争强好胜的子路肯定是想大显身手的，然而射礼不专门学习是会闹笑话的，而孔子的课堂就有射礼教习。这样顺理成章，子路成为了孔子的弟子。

百里负米的柔软孝勇与冠佩陵暴的刚猛血勇，看似对立的两面，实则统一于子路质直的底色中。孝亲之勇，是本心良善的自然流露，不求虚名，只为尽心尽责；刚猛之勇，是性情本真的直接抒发，不畏权势，只为顺遂本心。刚柔双重特质，共同构成了子路血气之勇的完整形态。

这份独特的人格底色，赋予了子路勇德的可塑性。若只有刚猛陵暴之性，其勇终将沦为粗鲁暴戾的匹夫之勇，无仁义升发的根基；若只有柔软孝亲之质，其人格虽纯良敦厚，却无刚毅笃行的力量，难以成就殉道守

义的大德。正是刚柔兼备、质直无伪的先天禀赋，让孔子看到子路之勇的先天强大的生命本源，后天只需以礼义规约、用学问涵养，便可推动其从本能的血气之勇向德性的君子之勇迭代升级^[5]。

3 孔子以礼、义、智对子路勇德的重塑

子路血气之勇的先天特质，决定了其勇德的成长必须依托后天教化的规范与引导。孔子立足子路质直好勇的本性，构建了以礼裁勇、以义导勇、以智化勇的三维教化体系^[6]，分别从言行节度、价值内核、实践智慧三个层面改造其原始血勇，最终完成了其勇德由先天血气向伦理德性的质变，塑造出以道义为纲、中正为度的君子之勇。而子路治蒲，正是这一勇德成长的淬炼场。礼、义、智化为治能，勇升华为担当。孔子三称其“善”，见证的正是这种勇在政治土壤中的生长与成熟。由血气之刚而为治世之能，由修身之德而为理政之器。

3.1 以礼裁勇

礼是儒家言行举止的核心准则，也是矫正血气之勇失度、失序、失谦的首要标尺。子曰“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恶勇而无礼者”（《论语·阳货》）^[7]。勇必须以礼为节。前者指出“恭慎勇直”等美德若脱离“礼”的规范，都将走向反面；后者明确表达出讨厌勇而无礼的人。子路未经教化的勇，最突出的弊端便是率性而为、无有节度，言行急躁、不知谦让。《论语》中两处经典对话，清晰展现了孔子以礼裁勇的教化逻辑。

《论语·先进》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问诸子之志。子路不假思索“率尔而对”^[7]，抢先陈述其治军之志。孔子通过“哂之”这种极其委婉的方式来教育子路和侍坐的弟子。细品其“哂之”的原因：其一，从侍坐之礼来说，弟子应答当有序有节或顾望同学以示谦让，或待师指名而后言，子路“率尔而对”，失了言说之序；其二，从礼的精神上来说，“礼”之内核在于“让”，子路之志不仅内容宏大，其言辞表达更毫无谦抑之态，失了谦让之德；其三，从孔子的治国理念来说，孔子的理想是建立礼乐社会，子路治国偏重“富国强兵”，未能领会礼乐教化为孔子治国第一要义的理念，失了治国的根本。因此，孔子在曾皙问为何哂由时给出了“为国以礼，其言不让”的理由，夫子“哂之”，不是哂其志，而是哂其无礼。率先陈述自己的理想，是勇，但子路言语轻率、自矜自许，尽显躁进无礼

^① 黄敦兵导读注释. 孔子家语[M].长沙:岳麓书社,2019.第47页

^② 司马迁著张大可译.史记(文白对照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第1196页

之态，这些必须要悉心修剪。

《论语·子路》载孔子说为政“必也正名乎”，子路对之“有是哉，子之迂也！”^[7]这场争论的本质，是子路以“务实”之名，挑战了孔子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子路的失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子路未能领悟“礼”作为政治秩序根基的重要性，将“正名”这一重建礼制的核心举措视为迂腐之举；二是与师长对话的方式，违背了儒家“尊师重道”的基本礼节，言语直白冒犯、全无尊师敬学之礼。“正名之争”更凸显子路粗野未化的特质，与《史记》“性鄙”一脉相承，可见其血气未消、礼德未立的人格短板。

《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7]孔子指出子路有“兼人”的问题，所以开出了“退之”的药方，是夫子“以礼裁勇”的最好体现，夫子以孝悌人伦、礼法次序节制其躁勇。

纵观三则论语，可见，子路之勇，其弊在躁进、率直、失度、缺乏深刻的认知。孔子因材施教，始终以“礼”为绳墨加以裁制：侍坐“哂之”，裁其言说之序、谦让之德与治国之偏，纠其仪节、心性 with 政教三重之失；正名“斥之”，裁其正名迂阔之疑、尊师礼度之亏，纠其政治认知与师生伦常双重之失；闻斯行诸“退之”，裁其勇进兼人之躁、孝悌父兄之序，纠其血气无节与人伦践行双重之失。三处点拨，层层深入，皆紧扣“礼”之内核。孔子之教，不在摧折其勇，而在导“血气之勇”升华为“义理之勇”，使勇德归于礼法^[8]。

3.2 以义导勇

义者，宜也。它是判定行为是否正当的准则，为勇划定方向与边界。当血气之勇偏离道义，沦为争强斗狠时，义便以“当为”与“不当为”加以裁断。

《论语·阳货》篇载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答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7]此章直指“义”为“勇”之上位原则。子路素以勇力自矜，其问“君子尚勇”者，盖以勇为君子之德而欲求夫子肯定。孔子却不直言尚与不尚，而将勇纳入义的统摄之下。有义之勇则为君子之德，无义之勇则君子之乱、小人之盗。此即确立义为勇之先决条件。勇若不以义为前提，则非德性而属恶行。孔子此答，乃是正本清源，从根本上矫正子路以勇为独立价值之偏。

《中庸》载子路问强，孔子以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对举，谓“宽柔以教，不报无道”，为南方之强，“衽金革，死而不厌”为北方之强，而君子之强则在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

死不变”^[7]。子路之问，盖以武力刚猛为强，孔子却将此“血气之强”置于“道义之强”的对照之下。南方之强以宽柔胜刚暴，已见义之权衡；君子之强则更以守道不变为归，无论国家有道无道，皆以道义为持守，方为真正的强。此章由勇进至强，而强之内涵亦以义为界定，较之“君子尚勇”章更为深入。不仅论勇当以义为尚，更揭示出真正之强恰恰表现为对道义的坚守，而非外在的武力刚猛。孔子此处的回答旨在引导好勇的子路，追求一种合乎中庸之道的、以德义为核心的强，而非单纯的血气之勇。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孔子答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9]。孔子此答，特以“卞庄子之勇”为子路树立勇之典范。卞庄子乃鲁国著名勇士，其勇最著者不在格虎之猛，而在“以孝节勇”之义。母在之时，为奉养慈亲，作战“三战三北”而不以为耻；母没之后，乃奋身杀敌，三获甲首以雪前耻，终战死沙场。其自言“三北以养母也，是子道也”，可见其勇非血气之刚暴，而有孝道人伦为之根本。这是子路与卞庄子的相似之处，再加上卞庄子与子路同乡，子路从心里容易接受并认可了这个榜样，后来也是沿着卞庄子的人生轨迹画上了自己生命的句号。子路奉卞庄子的“义勇”为楷模，也牢记夫子的“文之以礼乐”的统摄，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较之前二章，此章更进一层，不惟论勇当以义为尚、强当以义为守，更以鲜活的榜样昭示子路。真正之勇，乃是以人伦大义为根基、以礼乐文明为归宿的道义之勇。孔子“以义导勇”之教，至此由原则的确立、德性的辨析，进至人格的建构与榜样的树立，层层深入，终成其全^[10]。

3.3 以智化勇

智者，知也。它是明辨是非、审时度势的能力，为勇提供分寸与自知。当血气之勇表现为暴虎冯河式的莽撞或恃勇自矜的骄态时，智便以理性加以调和。孔子对子路之勇的第三重重塑，在于以智化之。义为勇确立了价值方向，使勇知所向、知所止；而智则为勇提供了理性保障，使勇不盲动、不妄行。

《论语·述而》载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答“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7]。子路素以勇力自恃，其问“谁与”者，盖欲夫子许其勇而与之同行。孔子不正面答以人选，而借“暴虎冯河”之喻深诫之。空手搏虎、徒步涉水，虽有勇而无谋，死而无悔非为勇气可嘉，乃为愚勇。孔子所许者，乃“临事而惧”之审慎，“好谋而成”

之周虑。惧非怯懦，而是对事之敬畏；谋非迟疑，而是对成事之智虑。此章将勇纳入智谋的统摄之下，勇而无谋，则勇仅为血气之悍；勇而有谋，则勇方为成事之德。孔子此答，正本清源，以谋与惧节制子路之躁勇，使其知真正的勇者必以智慧为权衡。

《中庸》载“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7]，其精神正与孔子教子路之旨相通。“知耻”非自轻自贱，而是对自身缺失之明察与不甘，知德之不修而耻之，则奋发以进德；知言之不信而耻之，则砥砺以立信；知勇之未正而耻之，则求道以正勇。子路闻过则喜、无宿诺之品格，正可见“知耻”已内化为其进德之动力。“知耻”所以“近乎勇”者，盖因耻感必以智识为前置，先能明辨是非、省察己过，方有羞愧之觉；有耻觉而后能奋起改过，方成勇猛精进之力。此章较“暴虎冯河”章更进一步，前者以谋制勇之外在行为，此章以智启勇之内在自觉，使勇从对外在结果的追求，转化为对内在德性完善的不懈动力。

《论语·阳货》篇载“六言六弊”指出所有德性若不经学之权衡与提升，都会流为弊病。“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7]一句，直指子路之失，子路以勇为美质，然若止于勇而不加学问，则勇将失其节度，流为躁乱。此学，非记诵之谓，乃明理之智、格物之思、辨义之慧也。勇必以学养之，方能辨其当为与不当为，知其当勇与不当勇。“六言六弊”章将智落实于学，以学统摄一切德性的根本途径，较前两章更为全面而深刻。不仅强调勇当有谋略（外在智术）与知耻（内在自觉），更指出一切德性皆须以学习来成全与提升，勇自不例外。好学则明理，明理则勇不妄发，发则必中节，此乃以智化勇的最高境界^[11]。

三章合观，孔子“以智化勇”的教化脉络清晰可辨。“暴虎冯河”章确立谋以成勇的原则，以智术节制勇之行为，是为第一层；“知耻近乎勇”章揭示耻以启勇的动力，以智识激发勇之内在自觉，是为第二层；“六言六弊”章统摄学以养勇的根本，以学问提升勇之德性品质，是为第三层。由外在行为之谋略，到内在自觉之耻感，再到根本途径之好学，层层深入，始终不离智之统摄与学之成全。子路之勇，至此方由“血气”升华为“理性”，而孔子因材施教之用心与“以智化勇”之精义，亦在其中矣。

3.4 子路治蒲

孔子以礼、义、智对子路勇德的三重教化，并非仅

停留于言传，更在子路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子路治蒲一事，正可视为其君子之勇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典型范例。

《孔子家语·辨政》^[12]载：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宽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③

孔子三称其善，分别从“境”“邑”“庭”三个层次予以肯定，其评价绝非泛泛之誉，而是有内在的德性逻辑。“恭敬以信”者，礼之体也。子路治蒲能持恭敬而取信于民，说明其言行已有礼之节度，不复当年“率尔而对”的轻率。“忠信而宽”者，义之用也。忠信为义的本质，宽厚为义的内容，说明子路能以义为政、宽以养民，不复当年“兼人”之过刚。“明察以断”者，智之发也。明察为知之审，断为勇之决，说明子路已能将“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智性要求转化为实际的治政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而三称其善，这与其“三称其恶”的批评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孔子对子路的期许与欣慰，在此不言自明。子路能将孔子的德性教化内化为实际的政治能力，说明其勇已从早年“陵暴”式的血气冲动，转化为以礼为纲、以义为质、以智为用的理性形态。这种转化，为其日后在卫国危难之际以“义”为准则、“勇”为手段践行“见危授命”的仁之大勇，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2]。

经过孔子以礼裁勇、以义导勇、以智化勇的三重重塑，以及治蒲实践的充分印证，子路之勇已从原始的血气形态升华为具有理性规范与道义方向的“君子之勇”^[13]。然而，君子之勇仍非勇德的终极形态。在儒家三达德的体系中，勇必须最终统摄于仁。子路勇德的最终考验，还在卫国的烽烟之中。

4 子路结缨而死所彰显的仁之大勇及其未完成性

仁是儒家德性体系的最高境界，也是勇德的最终归宿。君子之勇以礼、义、智来重塑，已然脱离血气之勇的弊端，但尚未抵达儒家勇德的最高境界。子路晚年在卫乱中，结缨而死，完成了君子之勇升华为仁之大勇，达成“杀身成仁”的德性高峰。

卫国之乱是子路勇德终极淬炼的关键场所。同门子羔出城，子路入城，毅然抉择了“食焉，不避其难”。这一决断，显示出子路彻底脱离了原始血气的冲动，升华为道义自觉与责任担当。子路的从容赴难，不是求壮

③ 黄敦兵导读注释. 孔子家语[M].长沙:岳麓书社,2019.第95页

烈之名,而是恪守“食人之禄、忠人之事”的臣子本分;不是逞勇武之性,而是坚守临危授命、守义尽责的君子根本。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其勇完全臣服于道义,展现出君子之勇最纯粹的责任内核,为仁之大勇的最终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4]。

卫宫混战,子路重伤,冠缨被击断。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子路放下了武器,从容俯身,静静地说“君子死,冠不免”,遂结缨正冠,坦然受刃。这一细节,绝非世俗所讥的迂腐虚文,而是“礼”的象征,是士君子身份与精神秩序的凝结。生死关头,他既不恋生,亦不畏死,唯独不失礼。子路以生命最后的气力,完成了一个君子对仪节的庄严守护。不是拘泥于形式,而是以“正冠”这一动作,向世人证明“礼的精神高于肉体的存灭”。此勇,至此已非“率尔而对”躁进,而是内化为对礼的绝对忠诚;其礼,亦非外在约束,而是融入了血性与人格的本然呈现。结缨正冠,子路以死守礼,展现了礼在极限考验中的最高尊严与力量。

《论语·阳货》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7]子路之死,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终极践行。他明知孔悝之难是死局,却毅然入城;他明知孤身赴敌无胜算,却决然不避。其勇,早已不为血气驱使,而完全听从于仁心的召唤。所谓“仁”,便是他对“食禄忠事”的信守,对君臣大义的担当,对弟子本分的自觉。当冠缨系紧、利刃加身之际,子路的勇与仁已达水乳交融之境:勇承载着仁的厚重,仁赋予了勇的方向。这一刻,子路不再是当年那个好勇斗狠的野人,而是孔子“仁者必有勇”的鲜活化身。他以血肉之躯,完成了从“好勇”到“成仁”的精神蜕变,为儒家的仁勇合一写下了最壮烈、最完整的注脚。

5 结语

子路的勇德,有一条完整清晰的人格升华脉络:从初入师门质朴原始的血气之勇到入师门后孔子以礼、义、智三维进行教化,蜕变为言行有度、道义为根、审慎有谋的君子之勇,最终在卫国之乱的实践中殉道,升华为杀身成仁、礼义仁合一的仁之大勇。子路以完整的生命历程,具象化展现了儒家个体德性修养的成长逻辑。

然而,子路之勇的终极形态并非儒家三达德中勇的理想范式。孔子“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音乐断语,最终成为了他勇德的最好总结。真正的勇敢,不只是临难一死的悲壮,更是将仁、智、勇融入日常生命

状态的修行;不只是完成“杀身成仁”的终极理想,更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从容中道。

子路勇德的未完成性,为后世儒家勇论的解读、德性修养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德性的成长一直以来都是动态精进的,勇武是可贵的,但以礼裁勇、以义导勇、以智化勇、以仁统勇,方能摆脱偏执与缺憾,实现从本能气质到圆满德性的终极升华。

参考文献

- [1] 陈立胜.《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12-123+205.
- [2] 黄敦兵导读注释.孔子家语[M].长沙:岳麓书社,2019.(P47-P95)
- [3] 司马迁著张大可译.史记(文白对照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P1196)
- [4] 仲大军.子路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P31-33;P48)
- [5] 田俊杰.“勇”的视域下孔门五大弟子的形象变迁[D].西南大学,2014.
- [6] 史帅涛.先秦儒家勇德思想及其演进[D].山西师范大学,2024.
- [7] 杨伯峻.杨伯峻四书全译[M].北京:中华书局,2020.(P108-P200.P138.P150.P136.P200.P24.P164.P100.P34.P196.P176)
- [8] 萧仕平.勇:从形式之德到内容之德——孔子论“勇”及其现代启示[J].道德与文明,2009,(6):50-53.
- [9]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0] 涂可国.儒家勇论与血性人格[J].理论学刊,2017,(4):90-101.
- [11] 王洁.先秦儒家勇德思想研究[D].渤海大学,2023.
- [12] 高培华.子夏为官与孔门武艺勇德考[J].史学月刊,2010,(9):30-37.
- [13] 崔雪茹.浅论孔子的勇德思想[J].孝感学院学报,2008,(2):5-9.
- [14] 冯前林,赵宇.子路之勇再探——基于孔孟荀勇德思想的视角[J].晋中学院学报,2024,41(6):32-37.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